

民国名人未解之谜

主编 郭太风

撰写	白华山	庄 金	刘成荫
	吕志伟	朱 利	乔秀云
	宋学立	李冠杰	李 纳
	陆灵艳	陈祖恩	何兰萍
	赵晋波	胡文兰	郭太风
	郭昭如	唐永余	袁 哲
	徐 佳	梅晓莹	廖大伟
	谭立君	蔡文雯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名人未解之谜/郭太风主编. —上海:文汇出版社, 2006. 2

ISBN 7-80676-962-5

I. 民... II. 郭... III. 中国-近代史-史料-民国
IV. K258.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9198 号

民国名人未解之谜

主 编/郭太风

策 划/施宣圆

责任编辑/陈飞雪

封面装帧/周夏萍

出版发行/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2006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90×1240 1/32

字 数/280 千

印 张/12.5

印 数/1—8000

ISBN 7-80676-962-5/G · 516

定 价/22.00 元

目 录

孙中山与黄兴

革命双雄携手细节——孙黄相识之谜/1

分裂,还是分化?——中部同盟会成立之谜/6

张謇与袁世凯

道不同,岂可谋?——张袁交往之谜/11

熊秉坤

“熊一枪”是否名副其实——辛亥首义之谜/16

黎元洪

革命党人相争,不革命者得利——黎元洪成为鄂督之谜/20

陈其美

沪军都督是青帮头目吗?——陈其美身份之谜/25

陶成章

终结光复会的枪声——陶成章被刺之谜/29

宋教仁

责任内阁制美梦破灭——“刺宋案”幕后主使人之谜/33

蔡 锷

“风流儒将”脱身有术——蔡锷逃离北京之谜/37

袁世凯

口头密约,抑或正式条约?——“二十一条”中日交涉之谜/43

皇帝梦破灭——袁世凯死亡之谜/47

张 勋

复辟闹剧匆匆收场——“辫帅”张勋剪辫子之谜/52

蒋介石

“郑三发子”以假乱真——蒋介石身世之谜/57

民国元首一则秘史——蒋介石何时拜黄金荣为师之谜/65

以退为进、欲拒还迎——蒋介石拒绝筹办黄埔军校之谜/69

蒋介石夺取军政大权的契机——中山舰事件之谜/78

以屈求伸——1927年蒋介石下野之谜/82

焦土抗战一曲悲歌——长沙大火之谜/88

难说千秋功罪——花园口决堤之谜/92

陈洁如

蒋介石的如夫人——《陈洁如回忆录》之谜/97

蒋纬国

像他，还是更像我——蒋纬国身世之谜/104

廖仲恺

国民党权力分配的转折——廖仲恺被刺之谜/109

孙美瑶

洋人成了绑票——临城劫车案之谜/113

王天培

徐州会战的替罪羊——王天培死因之谜/117

蔡志堪

两昼夜抄出的机密情报——《田中奏折》真伪之谜/121

张作霖

“东北王”蒙难撤退途中——皇姑屯炸车案之谜/125

孙殿英

孙殿英为何逍遥法外？——东陵盗宝之谜/130

李烈钧

国民党元老心灰意懒——李烈钧淡出政坛之谜/136

冯玉祥

集团军司令变成光杆司令——冯玉祥中原大战惨败之谜/140

反衬官场腐败——冯玉祥“贺寿送水”之谜/145

宋子文

财政部长有惊无险——谋刺宋子文案件之谜/150

张宗昌

狗肉将军的下场——张宗昌死因之谜/154

杨杏佛

洒血吁人权——杨杏佛被杀之谜/159

婉容

末代皇后的苦楚——婉容外遇之谜/164

孙传芳

居士林里命丧枪下——佛堂喋血案之谜/169

杜重远

他为何不出示审稿证？——《闲话皇帝》案之谜/174

张学良与杨虎城

扭转时局的关键——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谜/178

杨永泰

变色龙张扬触众怒——杨永泰被杀之谜/183

张啸林

青帮大亨乐极生悲——张啸林命丧高楼之谜/187

陈绍宽

悲壮的“水上马其诺”防线——江阴沉船封江之谜/191

高崇武

违背蒋介石意旨的秘密外交——高崇武私下赴日交涉之谜/196

易培基

被告有理不出庭——故宫盗宝案之谜/202

唐绍仪

民国首任总理晚节如何？——唐绍仪被杀之谜/208

汪精卫

民族的败类——汪精卫叛逃之谜/212

一代巨奸枪毒复发——汪精卫死因之谜/216

来历不明的信件——汪精卫遗嘱之谜/220

刘 湘

“四川王”落难武汉——刘湘死因之谜/224

丁默邨

丁默邨险中美人计——郑苹如除奸之谜/229

石友三

“倒戈将军”聪明反被聪明误——石友三活埋之谜/234

史迪威

壮志未酬，黯然回国——史迪威事件之谜/238

中国远征军出境抗日——第一次缅甸战役失败之谜/243

戴 笠

集中营，还是情报所？——解开中美合作所之谜/248

军统首脑穷途末路——戴笠死因之谜/253

李士群

汪伪特工总部头目之死——李士群暴死之谜/257

李香兰

“不谢的夜来香”——李香兰国籍之谜/261

汤恩伯

“以德报怨”——战后日本人遣送政策之谜/271

荣德生

官祸甚于匪——荣德生绑架案之谜/277

陈 仪

国民党赴台第一大案——台湾“二·二八”事件之谜/282

王云五

剽窃,还是创新?——四角号码检字法发明人之谜/287

币制改革挽救不了时局——金圆券崩溃之谜/293

川岛芳子

“帝国谍报之花”魂飞梦断——川岛芳子处决之谜/298

陈布雷

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弃世之谜/303

蒋经国

蒋经国英雄气短——上海“打老虎”有始无终之谜/309

蒋经国婚外恋情的悲剧——章亚若死因之谜/313

空前海难无从释疑——“江亚轮”沉没之谜/317

黄金荣

帮会泰斗的暮年生涯——黄金荣不去香港之谜/322

王国维

清高,还是愚执?——王国维留辫之谜/327

悲情学人超然俗世——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之谜/332

鲁迅

日籍医生有无责任?——一代文豪鲁迅死因之谜/337

张大千

大师何所思?——张大千毁坏敦煌壁画之谜/342

贾兰坡

漫长曲折的探寻之路——“北京人”化石去向之谜/347

张爱玲

荒凉文坛一枝独摇——张爱玲成名之谜/352

阮玲玉

一代影星陨落大上海——阮玲玉自杀之谜/357

史量才

直言竟召杀身祸?——史量才被刺之谜/363

苏曼殊

行云流水一孤僧——苏曼殊人生之谜/369

何丰基 VS 清水节郎

谁开了第一枪？——卢沟桥事变之谜/375

李涛 VS 梅登

中英陆海军长江交火——“紫石英”号事件之谜/380

后记/384

孙中山与黄兴

革命双雄携手细节 >>>> 孙黄相识之谜

20 世纪初,孙中山与黄兴为了反清革命,振兴中华,分别创建了兴中会和华兴会。黄兴在起义失败后避居日本。这时孙中山为了联络革命志士,从欧洲乘船来到日本。他俩在日本首次会晤,并创立了同盟会。孙中山与华侨有广泛联系,黄兴则在留学生中很有影响。孙、黄合作,对于革命力量的联合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样两位革命家初次见面是谁介绍的呢?长期以来史学界有两种说法,有人说是日本人宫崎寅藏介绍的,另有人说是立宪派人物杨度介绍的。

第一种说法:孙、黄会面是由日本友人宫崎寅藏介绍的。此说来自于《宫崎滔天全集》第一卷《清国革命军谈》。据宫崎寅藏回忆,孙逸仙由欧洲抵达日本后,去他家访问。孙中山询问,在中国学生中是否有非同一般的杰出人物。宫崎说,有一个叫黄兴的湖南人,堪称伟人。孙中山当即提出要去拜会黄兴。于是他俩相携来到神乐坂附近的黄兴寓所。宫崎要孙逸仙在门口等一会,他推开格子门喊了一声“黄先生”,宋教仁(即狼啸月,日本福冈县筑紫郡人,曾加入中国同盟会。)和黄兴一起探出头来。然后,黄兴携同宋教仁、宋教仁、宋教仁三个人出来了,大家一起到中国餐馆凤月园。寒暄过后,彼此不拘礼节,有一见如故之感,他们很快就开始谈起国家大事来。当时在场的张继后来回忆道:

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年)……夏间,总理(孙中山)由美来倭,宫崎寅藏介绍克强(黄兴)晤面,商组革命大同盟事。

黄兴在《在旅京善化同乡会欢迎会上的演说》中提及与孙中山会面前后情景:

时与中山先生犹未谋面,不过早已知名。嗣以日本大使白浪滔天(宫崎寅藏)等介绍,始相认识,遂共商组织各机关等计划,革命事业至此始稍有头绪矣。

持此种说法的还有薛君度的《黄兴与中国革命》,台湾国民党史会编的《国父年谱》,毛注青的《黄兴年谱》、《黄兴年谱长篇》,尚明轩的《孙中山传》,以及陈锡祺主编的《孙中山年谱长编》等。

第二种说法,是立宪派人物杨度介绍的。杨度多次向亲戚朋友讲述他介绍孙、黄相识的情形。左舜生在《黄兴评传》中说道: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中山先生至日本,时哲之(杨度)亦正留学东京……中山爱才如命,雅欲罗致之以张其军。哲之(杨度)以不愿革命辞。中山强之再四,哲之乃介黄克强先生与中山晤谈。孙黄之携手,实以哲之为谋介也。此事余亲问之哲之。时在座同闻此一段故实者,为章太炎(章炳麟,浙江余杭县人)先生、赵夷午先生、哲之先生之哲嗣公恕及余也。

章士钊在《与黄克强相交始末》中也提到,他曾经到东京,住在牛込区若宫町二十七番地,不久黄兴来了,和他住在一起。当时孙

中山也来到东京,想联合留学生,继续反清运动。而留学生中杨度比较有名,他当时住在富士见町,中山特地到他家商议,他俩谈了三昼夜……后来杨度以投身宪政为由,拒绝了与孙中山一起革命,但推介绍了黄兴。中山第二天便到黄兴所住的宫町室拜访他。因为黄兴和章士钊一起住,所以章士钊便参加了黄兴与孙中山的第一次见面。他们三个人一起讨论天下大事,并商讨成立联合组织。

持此说的还有金冲及的《辛亥革命史稿》、邵传烈的《孙中山》、以及何汉文的《杨度传》。

日本学者中村义 1983 年在日本《辛亥革命研究》第 3 号上发表了《滔天是孙文与黄兴初次见面的中介人吗?》,认为介绍人是杨度而不是宫崎滔天。他的理由是:其一,宫崎是凭记忆写下的,难免在年代和事实方面有错误。例如,宫崎说当时宋教仁也参加了会见,但《宋教仁日记》中却没有记载。其二,章士钊的文章明确记载“克强与吾初见先生”。章与黄同是湖南人,当时生活在一起,而章又是文学家,又具有理论学识,因此章的文章是可信的。其三,杨度早在 1903 年已经与孙中山有所交往,杨度与黄兴也有过亲密接触。

但中村义的分析遭到了质疑。萧致治在《黄兴评传》中辨析道:中村义说宫崎的文章是凭记忆写的,但章士钊的文章也是凭记忆写的,不能因为章是严谨的文学家而否认宫崎的回忆。其次,杨度与孙中山、黄兴有过交往,但孙中山与宫崎的交往更深。萧致治在《回顾与展望——国内外孙中山研究述评》一文中认为,宫崎是主要介绍人,而杨度只是推荐了一下黄兴,决不是主要牵线人。

他提出了以下几个理由:首先,宫崎与孙中山、黄兴的交往比杨度与孙、黄的交往要密切得多。如 1905 年孙中山抵达日本之前宫崎曾致函孙中山,孙于 6 月 4 日复函,告以抵达横滨的具体时间。孙中山到日本后,他的活动不是由宫崎就是由程家桢安排或伴送。其次,张继、黄兴本人都说是宫崎介绍的。冯自由在《中国

同盟会史略》中也说是宫崎介绍的。与黄兴最亲近的人物刘揆一也说是宫崎介绍的。由此观之,萧致治的这些质疑是有道理的。

但是萧致治也有反驳不力的地方。比如中村义认为孙、黄介绍人是杨度而不是滔天的理由之一是:宫崎说当时宋教仁也参加了会见,但《宋教仁日记》中却没有记载。据宋教仁日记记载,7月25日,宋教仁至程家桢寓,程家桢告诉宋“孙逸仙已到东京”,28日,孙中山与陈天华、宋教仁等会晤于《二十世纪之支那》社。29日,华兴会内部开会商量联合问题。宋记载道“先是,孙逸仙已晤廖午(即黄兴)”,没有记载孙、黄见面时还有何人。对于宋教仁在日记中没有记载宋教仁参与孙、黄见面的问题,萧致治没有正面回答。

另外,萧致治还根据《宋教仁日记》来反驳杨度介绍说的错误。萧致治从《宋教仁日记》中推测孙中山在横滨待了几天后,约于24日到东京,从24日到27日只有4天,期间孙还会晤了邓家彦、陈天华、宋教仁等,不可能像章士钊所说的孙、杨“聚议三昼夜不歇”之翌日,与黄兴见面。萧致治的反驳不能从根本上解释疑问。我们知道章士钊回忆是几十年之后了,难免有错误。况且杨度、章士钊回忆时,孙中山、黄兴已是领导辛亥革命取得成功的领袖,难免有自我表彰之意图。

那么萧致治认可的宫崎说是否就完全正确呢?这也不一定。宫崎说他在东京认识黄兴是日本明治十三年(1901年),而事实上黄兴1905年6月才抵东京入弘文书院,1901年黄兴还在武昌两湖书院。又如,宫崎说孙、黄初会时宋教仁在场,而宋教仁的日记、张继《回忆录》,以及黄兴在《在旅京善化同乡会欢迎会上的演说》,均未提到宋教仁在场。期间的出入,可能是宫崎回忆有误所致。

究竟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呢?笔者认为宫崎介绍说和杨度介绍说都是凭回忆写下来的,难免有错误,而且可能掺进了个人感情因素。但不宜因为有小错误而否定哪一说。宫崎、杨度都自称曾

经向孙中山介绍过黄兴,这基本上是可信的。但首先介绍并参与孙黄见面的很可能是宫崎,因为宫崎介绍之说是在 1911 年公布的,杨度介绍之说在 30 年代才出现,如果是杨度首先介绍孙、黄认识的,杨度肯定要纠正宫崎之说的错误,但他却没有纠正。这是为什么呢?很可能是杨度在回忆时,已经知道宫崎介绍说了,为了给自己抬高身价,把自己说成是孙、黄会晤的主要介绍人,但不便否认宫崎介绍说。而且从左舜生和章士钊的言论来看,都没有写到杨度参与孙、黄的第一次见面,他们不可能把这么重要的事忘掉不写。而宫崎在《清国革命军谈》中就写到了他参与了孙、黄的见面。由此推论,他最可能是主要介绍人。

(梅晓莹)

分裂 还是分化？

>>>> 中部同盟会成立之谜

为了把革命的重心转移到长江流域，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于1911年7月31日在上海四川路湖北小学召开成立大会，通过章程及宣言，选出谭人凤、宋教仁、陈其美、潘祖彝、杨谱生等为总务干事，后又推举谭人凤、宋教仁为总务会议长。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积极在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各省设立分会，收揽人才，并加强与武汉地区革命党人的联络，促成武昌起义的爆发。中部同盟会在同盟会之外另树一帜是不是分裂组织的行为？学界历来有争论。

第一种观点认为，成立中部同盟会是分裂行为。林增平等编著的《辛亥革命》，以及沈渭滨撰写的论文《论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成立》，均持此观点。他们认为中部同盟会的成立是同盟会自身分裂过程的一个必然产物，是对同盟会的一种分裂行为。

沈渭滨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第一，在同盟会外另立组织，是分裂行为。他论述道：因为孙中山、黄兴已经离开东京，同盟会无人主持，形同虚设。上海交通便利，组织中部同盟会，等于把东京同盟会搬到上海，这说明了谭人凤在执行广州起义计划时，已经把东京同盟会和中部同盟会等同起来。广州起义的失败，许多革命领导人灰心丧气，孙中山只好到南洋图东山再起，宋教仁、谭人凤等人为了实现其“自早为计”的主张，1911年7月间在上海正式成立了中部同盟会。

其次，从中部同盟会的宣言来看，宣言斥责了东京总部“有共

同之宗旨而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而无切实之组织”，“是临时召集乌之众，余于党中，冀侥幸以成事”。广州起义后，总部领导人“一则以气郁身死，一则以事败心灰。”（赵声气愤呕血而亡，胡汉民退避三舍，深居简出。）宣言强调“总理暂不虚设，留以待贤豪，收物望，有大人物出，当适如其分，不至鄙夷不屑就也。”沈渭滨认为这里说的大人物就是黄兴。所以从宣言的内容来看，实际上是因为对同盟会领导有所不满而采取的独立行动。

第三，中部同盟会的政治纲领是“以推覆清政府、建设民主的立宪政体为主义”，只包括了民族、民权两个方面，抛弃了同盟会纲领中的“平均地权”。沈渭滨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包括了民族、民权、民生三方面。中部同盟会抛弃了民权主义，这在宗旨上与同盟会总部的分裂。结论是，中部同盟会的成立是闹独立、搞派别、进行分裂活动。

沈渭滨的观点有可商榷之处。第一，广州起义后同盟会总部处于形同虚设的状况，谭人凤重视中部同盟会是理所当然的。第二，由于同盟会集全部力量发动的广州起义失败，中部同盟会必然会对同盟会进行批评。第三，中部同盟会的宗旨没有涉及“平均地权”，是否就能认定他们反对“平均地权”呢？不宜轻率下结论。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部同盟会是同盟会的分支机构，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岑生平在《关于中部同盟会的评价问题》一文中持此观点。他引用了孙中山、黄兴发给中部同盟会的函件，以及中部同盟会的宣言来证明这种关系。

黄兴给中部同盟会的信中，盛赞中部同盟会在武汉起义中的所作所为，他写道：

迨者蜀中风云激发，人心益愤，得公等规画一切，长江上下自可联贯一气，更能力争武汉，老谋深算，虽诸葛复生，不能易也。光复之基，即肇于此，何庆如之！

黄兴为了指导中部同盟会的军事策略，以自己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对中部总会在用人、军律等进行告诫，致函陈其美、谭人凤、宋教仁等：

鄂部既定为主力之地，用人极为重要。沪上虽仅有机关，其乞丐侦探甚多，应当注意。……觉公如鄂事紧要，即不必来港，列公酌而行之，弟必赞同也。

这类信函说明黄兴在指导或领导着中部同盟会。

孙中山在《革命原起》评论道：

陈英士、宋钝初、谭石屏、居觉生等既受香港军事机关的约束，谋为广州应援，广州既一败再败，乃转谋武汉。

这说明孙中山对转谋武汉是肯定的，中部同盟会的活动并不是分裂行为。

中部同盟会的宣言解释道：“奉东京本会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而以中部别之，名义上自可无冲突也。”说明中部同盟会没有另树一帜。中部同盟会的宗旨明确：“以推覆清政府、建设民主的立宪政体为主义。”尽管没有涉及“平均地权”，但不宜因此推断他们在“主义”上搞分裂。

但这种观点并非无懈可击。黄兴对中部总会在用人、军律等方面进行告诫，这只能反映他支持并关心中部同盟会的军事策略与部署，并不可说明他的指导作用。以下史实可以说明黄兴没有领导过中部同盟会。1909年武昌起义爆发，湖北军政府接连向上海发报，电请黄兴赴汉，“以资镇摄”，黄兴这才离开香港抵达上海，再从上海到达汉口，然后才担任战时总司令，指挥民军同清军战斗。黄兴既然在此前长期未在中国内地，他怎能指导中部同盟会

的革命策划？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也流亡海外，专注于南洋等地的活动，很少关注国内的革命组织建设，所以不可能对中部同盟会进行领导。

笔者撰写本文时请教一名近代史专家，他提出新的见解：中部同盟会是从同盟会中“分化”出来，并不是分裂行为。因为分裂是贬义词，是另树旗帜，如“民族分裂主义”。而分化是中性词，是从原来的组织中自然脱离出来的，犹如瓜熟蒂落。

首先，中部同盟会没有另树旗帜，仍保留了“同盟会”三个关键词。中部同盟会的宣言明确表示：“奉东京本会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而以中部别之，名义上自可无冲突也。”它没有举出反对同盟会的旗帜，而是在同盟会的名义下活动的，所以不是分裂行为。

其次，中部同盟会的成立是分化行为吗？

从中部同盟会成立的背景来看，中部同盟会成立是在日本的同盟会东京本部处于涣散状况下成立的。从1907年开始，孙中山因《民报》经费纠纷，很少再过问本部的事务，把工作重心放在华南等边疆地区，针对这种情况，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都提出过改良同盟会会务，把工作重点放在长江流域的建议。后来成立的同盟会中部总会从领导体制到起义策略都作了不同于东京本部的改革。同盟会中部总会在组织上实行参议会制，在常设的领导机关实行集体领导，以克服个别领导负责制带来的弊端，达到集中群众智慧与活力以振兴党务的目的。这些主张和做法，不同于东京同盟会总部的，是在领导体制上对同盟会总部的更正，体现了“分化”的积极作用。

从中部同盟会下属分支机构看，也体现了起义策略上“分化”的作用。中部同盟会“总机关设于上海，取交通便利，可以联络各省，统筹办法也；各省设分部，收揽人才，分担责任，庶无顾此失彼之虑也”。分部则有居正设立的湖北分会，焦达峰设立的湖南分